

# 书多成“灾”，让我在读书界出了名

潘年英



学、人类学、民族学、民间文学类图书，这类图书也很多，几乎占了我书房的大半壁河山，毕竟我是教这类图书的嘛；三是摄影和画册，这类图书我也非常多，不仅多，而且书籍开本都很大，很占地方，这类图书我没专门的书架来装，只好摆在书房中间的空地上，开始几年只有几十上百册，还好，现在已经堆满了整整一屋子，书房的空间几乎全部被占领了，连书桌也放不下了，我的书桌只好转移到到了卧室的窗台下。

我的书房里一共有多少藏书呢？不知道。我没数过。估算是在两万册左右。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号称有一万多册藏书，但我去他家参观了，说实话，他的书不及我的一半。所以，如果他有一万册的话，我起码有两万册。

都有些什么书呢？什么书都有。

我的藏书很杂。差不多只要是文科的书，我能看得懂的书，都会收藏。但大体来说，又集中在这三个方面：一是文学类书籍，这是收藏得最多的图书种类，历代文学名著我差不多都收齐了，还有那些不怎么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我也有不少；二是哲学、社会

后来我跟那女子并无缘成为一家人，但却因此激发了我对早日建立自己的书房的强烈欲望。我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甚至，也不请客吃饭，我把所有的余钱，都用来买书。没过几年，我的书就多得没地方放了。

我当单身汉时，只有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我就把一些不会经常看的书打包做成床垫，然后睡在书上，另外那些需要经常看的书，就堆在床的周围。有朋友来看望我，总担心那些书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倒下来埋葬我，我说不要紧的，被书埋葬，也是幸福的。

我后来因工作调动了几个地方，先是从贵州到福建，再从福建来到湖南，每次搬家，我都没有家具，只有书。搬家公司看到我没什么家具，最初开出的搬家公司价格都不高，但后来真正搬运那些书时，他们就感觉上大当了，要求加钱，我同意，给他们加钱。

我调到湖南后，分到了145平方米的房子（在福建是165平方米），这是实实在在的居住面积，没有公摊，四室两厅两卫一厨，我除了有一间完全是书的书房，其余的房间也都装满了书。我们家是不装修的，就用书架来装修四面的

墙壁。很多朋友来到我家，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书多。

“天啊！那么多书！看得完？”这是他们经常发出的感叹和疑问。

我说绝大多数都没看。

“那你买来干什么？”

“喜欢。”

对，就是喜欢。我说了，我这人，没别的爱好，就只喜欢买书。可以说是买书成癖。从前是把逛书店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现在是把网购当成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以至于到了一天不买书，心里就发慌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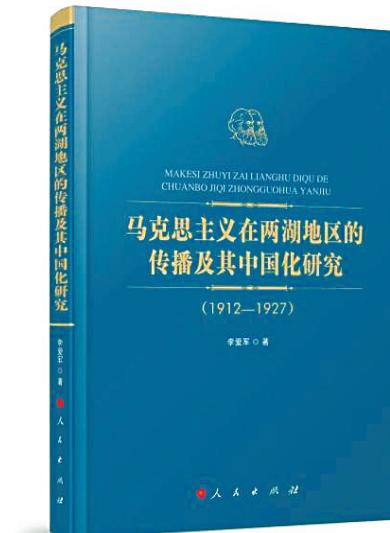
书多成灾，我在家里已经待不下去了。现在，我被我买的书挤出了家。我在办公室里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书房。在这个空间里，我只摆放了一百来本书，我心里的打算，是把这一百来本书认真看完，就很不错了。但是，刚写到这里，我的手机铃声又响了，是一条网购的新书到货的短信。我知道，要不了多久，这个书房空间也会很快被新的图书占领，我到时候去哪里栖身，还真是个大问题。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作品四十多部。）

读有所得

## 一本拓展马克思主义地方传播史研究的创新力作

杨金海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爱军同志新著《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传播及中国化研究(1912—1927)》近日出版。该书从“两个结合”视域出发，结合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的现代性因素、传播渠道、历史进程、主要媒介、主要内容、传播效果、历史经验和局限及其当代启示等一系列问题，凸显了鲜明的理论特色与厚重的学术追求。初读该书，受益匪浅，感觉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和主要建树。

第一，深入探讨了两湖地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理论贡献。中共创建时期，两湖地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阵地，其地位仅次于北京、上海等地区。依据是多方面的：一是涌现了一批湘鄂赣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如湖北的李汉俊、恽代英、董必武等，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二是产生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多部马克思主义革命书籍；三是产生了《今日》《武汉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时代》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大革命时期，两湖地区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地”。特别是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武汉成为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即“赤都”；

这一时期，两湖地区还出版了一批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书籍有60余种，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对于中国革命中之孟赛维克主义》等。

第二，深入总结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成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看，作者在书中对此进行了阐释，这一时期的实践创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和革命思想，使湖南省和湖北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两大重要的“革命策源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提供了“实验场地”；二是促进了两湖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初步形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后续发展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和领袖人物，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主体；三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初步结合，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初始形态即毛泽东思想萌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产生。

第三，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的历史局限性。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传播不仅有重大的历史贡献，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作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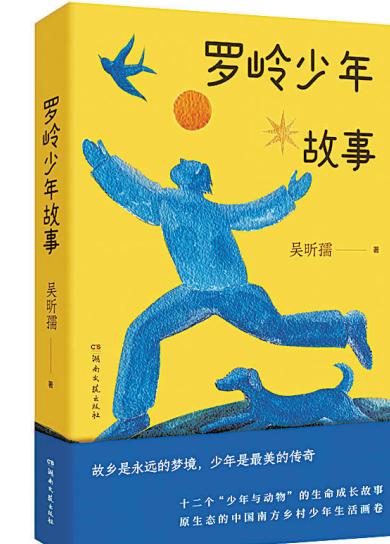
传播中其理论准备不足，存在着理论传播“碎片化”的症候；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两湖地区的传播与革命实际的结合还远远不够；三是传播广度和深度还很有限；四是湘鄂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具有坚定的信仰，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但还处于探索阶段。尽管如此，两湖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该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是有助于充分认识两湖地区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传播和创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推进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二是有助于推动两湖地区中共党史、近代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发掘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中的关键作用；三是有助于从地方史的角度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和传播的“源”和“流”的关系，推动、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共创建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研究；四是有助于从近代社会思潮的变迁中理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理解早期共产党人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历史轨迹。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 罗岭少年的成长故事里，有动物的气味

张家鸿



品读短篇小说集《罗岭少年故事》（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5年8月），如同走进作者吴昕孺的少年时光。虚构与想象交织其中，罗岭少年身上发生过的故

事，读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首先，它的情节富有趣味，这也成为文本充满感染力的重要来源。《雀殇》中，匹超口说他能用眼力把麻雀打下来。万里无云的日子里，他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握拳，自然下垂，挺胸昂首，结果五秒钟后，坠下的不是麻雀，而是麻雀拉出来的一团屎。“那团夹杂着白、黄、绿三种颜色的鸟屎，精准地命中了匹超圆睁的右眼——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最美的一团鸟屎。”在班级一直被匹超压过一头的少年，那天心里不知有多解气、多快意。

吴昕孺在写作中尽力还原本真自我。《罗岭少年故事》以作者少年时光为底本，当初不经意的糗事，有意求取却往往陷入尴尬的丑事，皆有令人啼笑皆非却童趣十足的流淌。在他笔下，童心的荡漾是最高的境界的真实。真实的童年不正是这样的吗？哪来负担或压力？遇到悲伤、痛苦之事，也很快被即将到来的某一种快乐迅速稀释、淡化至于空无。

其次，作者想象力丰富。以少年视角看待万物，无不亦真亦幻，充满好奇与神秘。来历不明的肖老师，主动为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宋大伯治病，征得其家人同意后，只见肖老师随手于窗台上捉了一只蚂蚁，从裤兜里拿出手电筒照着，几秒钟后，他让宋大伯张开

嘴，将那只蚂蚁放进去。“他继续捉蚂蚁，一只一只捉，用手电筒照一照，再送到宋大伯口里。送了几十百把只之后，肖老师不再捉蚂蚁，而是用手电筒直接照蚂蚁，凡是找到的蚂蚁自动往头上，往宋大伯身上爬，一直爬进他张开的口里。不多时，爬往宋大伯口里的蚂蚁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络绎不绝。”药引子是蚂蚁，治病辅助工具是手电筒，就此两样，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宋大伯后来竟得以痊愈。蚂蚁固然是《蚁灾》中的主角，不也是少年某段岁月的主角？万物皆备于我，如此看来，少年的罗岭村哪里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可以穷尽的？

还有那只独眼狗，与渐渐爱上晨跑的少年如挚友般相处几天之后，无端地消失了。也许是少年想要前往它住的地方，令它害怕或者不习惯？难道在外头与少年一段时间的跑步或玩耍，即是它传递善良与爱意的极致？总之，它再没出现过。可是在少年心中，它又好像从未离开。“从中学、大学，一直到现在，无论辗转到哪个城市或乡间，我都会准时起床，出门跑步。每次晨跑，我的脚边都会有另一个影子，它始终保持着与我平行，不领先半脚，也不落后一腿，无论我

何时半途而废，它都会跟在我身后，直到终点定在哪里，它都能保证和我同时到达。”每次跑步，都有它陪着。不仅仅这样，“这么多年来，我经受了无数的挫败，陷入过深重的迷茫，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它，它的爱，它的痴，它戏剧性的出现与决然的离开，它不同于任何其他生命的自成一格。”这就是人与动物默契、交心之后的神奇之处，它可以成为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伙伴，甚至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罗岭少年故事》飘散出各种动物的气味，是那么普通而日常，有着典型的中国南方乡村的风味。在很多人特别是当下很多少年看来，它们是臭的、脏的、但它们却成了帮助罗岭少年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存在。于是，这本书给我们带来反思：时下我们的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和作业中度过，是否也要想办法让他们走进五彩缤纷的大自然中，让他们与各种动植物交朋友，这样才会有真正健康的体魄和健壮的精神？

《罗岭少年故事》无疑是一部以人与动物交集为线索的成长记。当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里感到茫然失措，无所适从，乡村的一切或许正是我们苦苦寻觅、可以皈依的心灵故乡。



《汪曾祺作品精选集》。

编者按

近日，《汪曾祺作品精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前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的“全”相比，“精选集”更突出“精”，精选凸显作家艺术个性的名篇佳作。本书的一大亮点还在于书画卷，“精选集”在百余万文字之外，专为“书画卷”辟出一方天地，其中百余幅丹青水墨，题材丰富多样，是汪曾祺乐此不疲的“文章余事”，传达出他不倦的“生之乐趣”。

## 无事此静坐

汪曾祺

我的外祖父治家整饬，他家的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他有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木榻、漆桌、藤椅。这是他待客的地方。但是他的客人很少，难得有人来。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五个正楷大字：

“无事此静坐”。

我很欣赏这五个字的意思。稍大后，知道这是苏东坡的诗，下面的一句是：

“一日似两日”。

事实上，外祖父也很少到这里来。倒是我常常拿了一本闲书，悄悄走进去，坐下来一看半天。看起采，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一点隐逸之气了。

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诸葛亮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浮气躁，是成不了大气候的。静是要经过锻炼的，古人叫做“习静”。唐人诗云：“山中习静朝观槿，松下清斋折露葵。”“习静”可能是道家的一种功夫，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地孤寂，不闻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趣。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

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毛主席年轻时曾采取了几种锻炼自己的方法，一种是“闹市读书”。把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不受外界干扰，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一种习惯，也是环境造成



《汪曾祺作品精选集》书画卷内页。